

全 球 化 与 中 国 文 化 发 展 论 丛

中国当代语境下的 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

ZHONGGUO DANGDAI YUJING XIA DE
WENHUA MAODUN YU WENHUA ZOUXIANG

◎ 邹广文 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论丛

中国当代语境下的 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

ZHONGGUO DANGDAI YUJING XIA DE
WENHUA MAODUN YU WENHUA ZOUXIANG

◎ 邹广文 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 / 邹广文等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656-4866-3

I. ①中… II. ①邹… III. 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6035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ZHONGGUO DANGDAI YUJING XIA DE WENHUA MAODUN YU WENHUA ZOUXIANG

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

邹广文 等著

责任编辑 刘 冉 杨林玉 封面设计 郑 珏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http://cnupn.cnu.edu.cn>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75 插页 4

字 数 350 千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邹广文，1961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海内外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著有《当代文化哲学》《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文化、历史、人》《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等学术著作。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曾为韩国成均馆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等。其代表性成果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年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理论界），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内容简介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必须直面我们时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问题并予以解答。本书立足于我国现实文化发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时代境遇、历史背景、基本主题、主要矛盾、价值旨归以及文化自觉等相关问题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学理分析与研究，并强调“文化中国”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实践目标，这一研究对于走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师生、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理论工作者以及党政干部阅读。

目 录

导论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谈文化？	(1)
一、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定位	(2)
二、克服两极对立思维，培育文化建设智慧	(6)
三、以文化健康发展为核心价值诉求	(9)
四、当代文化研究要自觉切近中国问题	(15)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境遇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矛盾及其理论困境	(22)
一、全球化语境：现代观念的结构性共存	(23)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矛盾	(37)
三、从马克思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嬗变 ...	(50)
四、当代文化批判的基本路径	(82)
五、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遭遇”：中国文化矛盾的形成	(97)

第二章 文化矛盾的历史溯源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	(105)
二、现代化诉求下的近代中西文化论争	(120)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32)
四、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扫描	(137)

第三章 文化实践的基本主题

一、中国文化：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	(145)
-------------------------	-------

二、“统筹兼顾”——文化的丰富性	(152)
三、“和而不同”——文化的同一性	(158)
四、“与时俱进”——文化的自觉发展	(167)
五、“以人为本”——文化的主体性	(181)
 第四章 文化矛盾的总体性考察	(191)
一、民族特色与世界文明的矛盾	(191)
二、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矛盾	(206)
三、文化主流与文化多元的矛盾	(213)
四、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矛盾	(219)
五、虚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矛盾	(230)
 第五章 文化矛盾的类型性审视	(238)
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238)
二、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	(244)
三、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	(263)
四、网络文化与信息化	(274)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价值旨归	(307)
一、影响文化价值取向的前提性因素	(308)
二、呼唤整体性思维，实现对工具理性的超越	(321)
三、以中华中性智慧涵养现代文明	(340)
 第七章 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	(353)
一、中国道路的文化诉求	(354)
二、中国视角下的“文化软实力”	(366)
三、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提升	(382)

结语 “文化中国”的憧憬	(389)
一、提出“文化中国”的时代语境	(390)
二、“文化中国”告诉我们什么?	(393)
三、建构“文化中国”的着力点	(396)
后 记	(405)

导论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谈文化？

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文化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人是文化的存在，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同样是由于文化的力量而彰显其生机，一个社会变迁的突出标志就在于文化的变迁。唯如此我们看到，新时期 40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文化热”一直没有降温，且伴随中国社会发展的节奏一路走来。文化成了不同学科参与最多、不同社会阶层关注最多的领域，称文化研究乃今日中国之“显学”实不为过。

而且我们发现，全社会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更多情形下呈现为一种自发行为。今天，文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种新的时代发展语境无疑也给我们的文化思考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应该如何贴近时代？到底什么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探讨应该怎样和老百姓的诉求相关联？

我们认为，对以上问题的关注应该成为今天我们讨论文化最为迫切的选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文化讨论不是无文本的操作，需要我们诉诸价值关切，因为文化反思的目的是未来文化自觉，最终达到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自觉之路应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关切，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人类文化危机的反思和觉醒，并通过积极参与文化变革，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地位和能力，开拓文化发展新方向、新道路，以期实现中华文化的自我升华。

从这一视角看，我们求解当代中国文化的矛盾与问题，应该围绕以

下问题达成共识:

一、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定位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合理分析,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对此,我们的基本判定是“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

1930年心理学家荣格首先使用“共时性”(synchronicity)一词。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 1914—2009)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最先使用了“历时性文化”(diachronic cultural)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讲的“共时性文化”与“历时性文化”,是一种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来考察文化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文化活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来把握文化,后者侧重于以文化活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来把握文化。更确切地说,“历时性文化”体现了一个文化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情况(过去—现在—将来),表达的是文化的历时递进性,即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中一一展开和呈现的;而“共时性文化”表达的则是经过不同的历史演变、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共时并存于一个系统之中,体现了文化的时空共在性,即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同一时空中集中呈现、展示出来。

一般说来,文化具有动态生成性发展特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境遇,却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了迥异于常态文化生长规律的发展境况。如同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也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变化。无论是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还是后现代文化,这些本来在西方属于“历时性”发展呈现的文明形态,却伴随着人类信息化的大潮一股脑涌入中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时性”。如果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用短短的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50年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在文化方面,我们却没有像经济领域表现得那样从容,现实常常让我们猝不及防、无法拒绝,来不及做价值层面的取舍与判断。

今天,中国文化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我们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这也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主导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但须知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是文化复兴、是精神的充实自信。诚如习近平所言:“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但是,今天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的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影响力严重不匹配。据2013年12月7日《环球时报》所属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北京发布的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性强国”,但调查同时显示,中国仍是“经济体量强国、文化影响弱国”。根据调查结果,有73.0%的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所具备的世界性强国的条件是“经济实力”,而选择“文化影响力”的仅占2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继中国经济崛起在世界成为聚焦点之后,我们还要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从而在世界显示其独特的影响力。这说明,要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这种特殊的文化境遇给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呢?首先不容否认,面对开放的新环境,国外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同时也为本土一些新文化形态的生长提供了借鉴因素。例如,西方文化的引进带来了诸多先进的文化观念和管理经验,客观上培养了我们的文化竞争与创新意识,同时也催生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开拓了我们的文化视野;另外,外来文化的涌入还激活了我国的文化市场,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等等。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共时性呈现的文化景观也的确给我们的文化发展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其一是价值诉求的混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文化形态纷纷登

上社会舞台，甚至一些低俗文化也充斥于我们的文化市场，大众被各种所谓的“时潮”“时尚”所裹挟和绑架，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清醒意识。在多元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中，主流文化缺乏明确的价值诉求和清晰的价值观。这表明在这样的大转型、大碰撞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在文化价值层面，尚未达到充分的自觉，许多人在价值标准的取舍方面陷入了迷茫甚至混乱：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倡导什么，应该抵制什么；什么是值得崇尚的，什么是应该批判的……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几乎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掉进了模棱两可的泥潭。文化多元并不等于价值混乱，我们需要重塑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其二是文化生态环境失衡，良莠不齐。就学理层面而言，我们这里提出“文化生态”的概念，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视角来审视文化，把一个社会的不同文化形态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该民族的文化历久不衰，趋于平衡。本来，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是，在工业化、全球化时代，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杠杆的推动，诸多民族性、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被边缘化，甚至逐渐消失。现代性助长了现代人的傲慢，这种标准化、整齐划一的思维定式势必侵蚀文化生态的正常秩序，工业文明用人工的物质环境割断了文化和其赖以生成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人面对自己所创造的环境，感到疏离和陌生了。

在当代中国，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主要有四种：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我们讲文化生态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主流文化价值诉求不能有效地向社会基层传递和渗透，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亟待拯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市场日渐萎缩，大众感性娱乐文化则大行其道。在市场杠杆的驱动下，我们更多地彰显了文化的娱乐、实用与经济功能，而对文化的最核心层

面,即人文价值诉求、人的心灵建构等方面的关切不够。文化低俗化倾向日趋严重,无底线娱乐狂欢正在毁掉我们的大众文化,在娱乐化消费中造就了人们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从而使人缺乏严肃与敬畏之情。这四种文化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各自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主流文化如何有效地向社会大众言说自己的文化理想,并实现有效的社会价值引领?如何通过包括生产文化产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现代社会,精英文化是一种有思考与担当的文化,它的价值是依托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体验而实现的,健康的精英文化应该为社会提供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成为调节社会的积极力量。但时至今日,中国精英文化似乎并未真正担当起这样的责任。在一定意义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价值诉求方面具有此消彼长的矛盾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大众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在满足大众日常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常常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混淆了人们的主流价值诉求。一些大众文化生产商过度商业化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结果低俗文化在这种推波助澜中就慢慢风靡起来了。我们认为,相对而言,传统文化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发展与影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急功近利口号面前,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被经济利益所裹挟,从而无法展示其应有的文化魅力。总之,今天我们的神州大地除了大众文化一枝独秀外,其他文化形态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发展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共时性”问题——需要我们系统思考,统筹解决。

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环顾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现实,文化不能一味地“跟着感觉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离开主流文化的价值引导,一个社会的精英文化也要肩负起所应承担的文化使命。

面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殊定位,我们应该审时度势,保持清醒的认识。历时性文化和共时性文化的交叉互渗过程,也是一种文化洗礼或文化自我净化的过程。也许我们短时期内很难判断这种特殊的文化境

遇会对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种境遇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土壤。诚然,现代社会总体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人们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多样性、差异性,但在一些涉及社会发展整体走向的基本问题上,则必须有明确的底线和准则,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健康发展目标。

二、克服两极对立思维,培育文化建设智慧

现今时代,在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下,人类正在由离散时空文化走向同步时空文化,这意味着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引起全世界关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探索和特色实践,都开始具有世界意义。因此,今天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发展与实践需要立足于全球性视野,以自信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这其中,思维方式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因为思维的偏执既妨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妨碍着中华文明精神的世界传达。我们只有以和谐的、建构性的思维审视民族文化的发展,才能做到既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而又不失去自我,进而对不同文化形态所进行的比较、沟通和理解才有真实的意义。与他者文化共同建构新的世界文化体系,才是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

而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克服两极对立思维,在借鉴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培育中性互补的建设智慧,着力于文化与文明的积累与建设,扎实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对于我们这里谈及的两极对立思维,国人也许并不陌生。曾几何时,这种思维定式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导致人们的思想极度的教条僵化,社会生活被极度的意识形态化,长此以往,人们便形成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两极对立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线性的、简单还原论思维,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便形成“宁要……不要”“不是……就是”的话语定式和“宁左勿右”的行为准则,并以此去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其结果往往是把问题

简单化、绝对化。在两极对立思维者的眼中,经过简单化的抽象之后,世界俨然变成了一个线性的、决定性的世界。在评价事物分析问题时,也往往是非好即坏、非坏即好,一是则百是、一非则百非。是非好坏之间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两极对立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潜沉于人们的无意识之阈,成为一种深度模式,左右着我们对这个充满着随机性、不确定性、复杂性、非线性世界的认识。

显然,这种静止的逻辑预设并不能真正表达事物发展的真实过程,因为事物总是复杂的,对于现实事物来说,真与假、是与非、曲与直、美与丑等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常常是亦此亦彼、彼此胶着的关系。用矛盾规律来说,它们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事物更多的情形往往是在两极的中间和过渡状态之下展开的,即存在着多样态的可能性。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培育一种从容、稳健与宽容的文化精神,以此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实践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绷紧的神经、紧张的心理和匆匆的脚步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不经意中,“一路上的好景色来不及琢磨”。我们生活的质量在下降,在对手段的追寻中我们正在迷失生活的目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文化和思维层面进行检查与反省,以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从这一视角来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对于我们的当代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性智慧,^①对于我们今天放松心灵、缓解社会紧张、保有平常心具有直接的人生启示,需要我们很好地予以借鉴和发扬光大。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把

① 这在儒学思想家那里具体表达为“中庸”或“中道”智慧,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性智慧”,以彰显其当代性特点,但是其内在精神是相通的。对此,读者可参考以下文章:《中性智慧的思维旨趣与实践向度》,载《文史哲》,2009第1期;《论中国哲学的中性智慧》,载《江海学刊》,2009第4期。

“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以致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成为“中道”。“中庸”“中道”“中和”，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突出的思想特征便是“中”，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孔子反对过分的拘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也就是说，孔子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可见，孔子的这种倡导，也正是中性思维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蕴涵着丰厚的中性思维的思想资源，中性智慧的精义在于克服两极对立思维，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的状态。它不提倡感情的过分激烈与外露，不论是内在的思想理论，还是外化的审美实践，都崇尚含蓄、适度、克制，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达到主体人格的完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心理特征。我们在当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要善于发掘这种中性智慧，使之发扬光大。

中性思维是一种互补性的建设思维。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把握其发展态势。不难看出，这种思维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补益作用。这具体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它立足于建设，自觉去寻找事物的平衡支点，从而能够整体性、动态性地把握对象世界，尤其强调事物对立双方

的互养相成和共生共存。

其次,在人生态度上,中性智慧倡导保有“平常心”的积极人生,要超越浮躁与迷茫的功利心态,在对日常生活多重感知与审慎思辨的过程中敞开本然之心,以通达天地之境界,提升人生的质量。

最后,在行为方式上,它强调避免极端的行径,以中道之智慧践行于日常生活世界,与他者展开和谐的交往与对话,去解决因极端思维方式而导致的现实问题。总之,中性智慧是一种生成智慧而不是完成智慧,它不拘泥于思维向度的某种具体规定性,超越日益技术化的生活流程与程式化的僵滞思维。

总之,中性智慧提倡人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以“平常心”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平稳持续地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生成,在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三重维度上确立和谐、适当与豁达的人生境界。中性智慧要求我们除了满怀信心和豪情之外,还应多一些自省、冷静和平常心,使物质世界的建设与精神世界的完善并重,让创造文化正值与消除文化负值并重——这就是我们在新文化建设中所应确立的基本价值立场。

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文化破坏容易而建设难。一种有意义的文化积累需要我们精心去呵护,人类文明价值更需要我们去坚守。今天,我们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就需要自觉借鉴、发扬中性智慧,着眼于文化建设发展的全体性去致力于现代文化的建设实践。当科学发展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发展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均衡协调地处理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问题,要建立符合中性智慧的文化价值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自觉地以“贵和”“执中”的态度促进改革与发展事业的完善。特别是形成适应和谐社会文化心态,以中性智慧的思维方式审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探求文化实践层面的“视域融合”,融洽对话。

三、以文化健康发展为核心价值诉求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其突出标志是培育一